



冷戰終結後的日本自衛隊

● 楊子震*

日本自衛隊 1954 年成立以來，在「文人領軍」(Civilian Control) 的原則下，設有極為嚴格的限制，不得涉入現實政治，遑論左右國家施政。根據日本內閣府於 2015 年 1 月實施的「關於自衛隊與防衛問題的民意調查」結果，有超過九成的受訪者自認對自衛隊抱持有「良好印象」。現今，除部分特定政治立場的人士外，對多數的日本國民而言，自衛隊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2017 年 6 月，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因在東京都議會議員選舉的造勢演說中特意言及自衛隊，隨即受到大眾輿論的批判，朝野政黨亦皆表示其發言不甚得體，即使自衛隊內部亦出現微言。日本自衛隊的「軍隊國家化」(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至今已為日本政府與國民間共同支持並維護的價值。自衛隊脫離政府的指揮管制發動政變，進而企圖左右國家政策等場面，大概僅會出現於諸如《沈默的艦隊》(川口開治繪，1988-1996 年) 的漫畫情節。

然而，嚴守「文人領軍」原則的自衛隊，事實上並非從一開始便為日本國民所接受。從創建初始，對於自衛隊的存在本身是否即有違憲疑慮，日本的國內便有著批判與質疑。輿論界、學術界對自衛隊或其成員抱持有否定想法者亦不在少數。不過，時至今日，以自衛隊為題材的寫真集、雜誌屢屢成為時事的熱門話題。甚至以自衛隊為題材拍攝的連續劇，例如《飛翔公關室》(TBS，2013 年)，係被安排於黃金時段播放。這些事例在過往是極為難以想像的。

日本國民對自衛隊的觀感由「否定」「質疑」漸次轉變為「肯定」「信任」的契機

* 楊子震，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助理教授。

，經常為人所言及的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Great Hanshin earthquake）」以及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發生時的自衛隊救災行動。災害急難時的支援救助與民生合作，確實提高了日本國民間對於自衛隊的支持。與此同時，當初為日本國民所疑慮，遭受極多人反對的國際和平行動，現今亦較過往受到肯定。

日本自衛隊於冷戰結束後面臨了能否、是否以及如何參與「國際援助活動」的問題。美日安保體制的存在意義在於有蘇聯做為假想敵，但是隨著冷戰結束，安保體制的存續價值便有需要重新做一檢討。且因受到歐洲裁軍趨勢影響，在日本亦出現檢討是否縮小自衛隊規模、縮減日本防衛力的討論。另一方面，在冷戰



■阪神・淡路大震災（1995年1月）

結束後的波灣危機與隨後開展的波灣戰爭中，日本國內則為是否該派遣自衛隊從事國際援助活動等問題，陷入爭論與混亂。

隨著 1960 年代以降的高度經濟成長，日本躍升經濟大國之林，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日益增長。日本做為一個對世界政治經濟擁有影響力，並且受惠於國際社會穩定經濟活動的國家，自然而然地無論主動或被動皆必須做出



■東日本大震災（2011年3月）

與其經濟能力相符合的國際貢獻以為回饋。最具代表性的即為以「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簡稱 ODA）為中心的「開發支援政策」。而冷戰下，

日本一邊維持美日合作進程，同時亦著手摸索單純經濟援助以外可能的國際貢獻形式。藉由參與聯合國維持和平方動（PKO），對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做出貢獻，即為諸多選項之一。

日本在制定憲法時就已經討論到憲法與聯合國的關係。雖然主流的意見為「非軍事和平主義」，但當初亦曾存有日本做為一個獨立國家不僅依賴聯合國的集體安全功能，亦應積極地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的看法。事實上，日本外務省於日本加入聯合國後不久，即出現討論能否支援聯合國行動的聲音，1970年代以後，更積極地對此進行研究。惟研究亦僅停留在外務省內部，並未擴及政府其他部會，遑論形成共識。

1980年前後，因兩伊戰爭引起的波斯灣掃雷問題遂成為檢討是否在日美安保框架外派遣自衛隊以除訓練外的目的遠赴海外。因兩伊戰爭而遍佈於波斯灣的水雷，對油輪的航行安全造成嚴重的威脅。1978年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對日本總理大臣中曾根康弘（Yasuhiro Nakasone）政權提出協助掃除波斯灣水雷的請求。儘管兩政權謳歌同盟關係，互動良好。中曾根康弘首相與日本外務省皆持正面態度，但是由於針對自衛隊派遣的法律框架以及派遣自衛隊至尚未停戰區域有捲入戰爭的危險等原因，此提案最終仍被迫作罷。

1987年成立的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內閣倡言「貢獻世界的日本」，將「協助世界和平」「經濟援助」「國際交流」列為外交政策的三支柱。其中「協助世界和平」係為外務省的建言，希能以聯合國的維持和平方動為念，積極參與區域性的和平建構。然而，此些討論仍僅停留在外務省內部。防衛廳亦未對參與聯合國行動實施具體的研究。



■ 波灣戰爭中倍受矚目的愛國者飛彈（1990-91年）

波灣戰爭（Gulf War）的爆發暴露了日本在運用自衛隊於國際貢獻問題上的討論不

足與準備不周。1990年8月2日，伊拉克佔領科威特。其時的海部俊樹（Toshiki Kaifu）內閣接受了由美國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所提出的對伊拉克實施制裁案。甚至比聯合國還要迅速，於三天內便通過並發表了禁止進口伊拉克石油以及凍結經濟援助等內容的制裁，最初的應對可說相當迅速。

不過，在美國呼籲組成多國聯軍，英國決定派兵，北約亦採取相同步調後，日本的對應便陷入混亂，僅漸次湊集援助資金，而非提供人力資源。隨著愈來愈多的國家加入佈署於波灣地區的多國聯軍後，以美國為主的壓力與日俱增，日本政府與執政黨遂被迫儘速實施以派遣自衛隊為主的人力援助，以「業務委託」的方式派遣「兼任」的自衛隊員執行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任務。然而，急遽推出的《聯合國和平協力法案》送交國會審議時，又因政府各單位的答詢不一致而引起日本國內政局的極大混亂，導致無法通過表決。最終，日本未能在波灣戰爭中派遣自衛隊。

波灣戰爭未派遣實際人力參與一事，除在日本引起政治混亂以外，在外交的層面上，日本遭受國際輿論「too little too late」的批判。此即日本國內政治中的所謂「波灣戰爭創傷」。與所提供



■「九一一」恐怖襲擊（2001年9月）

的大筆資金（約130億美元）相較，日本所獲得的國際評價卻相當低。日後「九一一」事件後日本迅速對美國提供一連串支援行動，即奠基於此時的反省。而經由此次的紛擾，日本國民之間亦逐漸出現討論戰後日本和平主義的言論是否與國際常識脫軌的聲音。國際貢獻不應僅限於資金提供，亦因提供人力貢獻，視情況需要亦可能有派遣自衛隊的必要等主張漸次為人所理解或共鳴。

■ 建議參考閱讀書目

1. 松村歧夫、伊藤光利、辻中豊（吳明上譯），《日本政府與政治》（臺北：五南，2005年6月）
2. 五百旗頭真（吳萬虹譯），《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3年4月）
3. 李世暉、吳明上、楊鈞池、廖舜右、蔡東杰，《當代日本外交》（臺北：五南，2016年1月）
4. 佐道明廣（趙翊達譯），《自衛隊史：日本防衛政策之七十年》（臺北：八旗文化，2016年12月）

